

當史學遇到客家：解構後的重新認識

林正慧*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就歷史研究而言，史料文獻是立論的重要基石；而以後見之明來看，客家是晚近才形成的概念。但臺灣在戰後展開客家研究時，已普遍存在客家有著悠久的中原南遷歷史的成說。隨著研究的愈加深入，卻在歷史文獻中找不到客家，於是開始反思何謂客家，進而重新認識客家。本文擬以自身研究客家歷史的經驗，參照既有研究成果，觀察臺灣在戰後以來，以史學方法研究客家的歷程中，如何將由不同成說所堆砌的客家樣貌予以解構後，再重新認識的過程。史學反思客家的過程，同時見證了社會科學的邊緣理論、建構理論等在歷史上真實發生的過程。那些族源論述不能直接視為歷史事實，必須回到發生的時空脈絡，理清其形成的經過，才可能還原歷史的事實。因此，就客家研究而言，史學除了固守對史料的重視之外，已難閉門造車，必須多方與其他學科溝通對話，才能探究出比較真確的客家歷史。

關鍵詞：客家、客人、廣東人、福佬、福建人

* E-mail: pipi1119@gate.sinica.edu.tw
投稿日期：2019年11月13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3月26日

When Historiography meets Hakka: Re-recognition after Deconstruction

Cheng-hui Lin**

Assistant Researcher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We both know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in historical research, but there has a special case in Hakka research. When Taiwan launched Hakka research after the war, the term “Hakka” has lately been formed, but the concept of “Hakka” has had a long history of the Central Plains moving to the south. However, as the research deepens, researchers could not find the term “Hakka”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so they began to reflect on what Hakka was, and then re-recognized Hakka. This process witnesses the real process cycling from?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edge theory, to construction theory in the historiography. Those theories of ethnic origins cannot be directly regarded as historical facts. They must return to the context of time and space, clarify the process of their formation, and then they can move a little close to historical facts. Therefore, take Hakka research as an example. I consider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is necessary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explore a more genuine/authentic Hakka history.

Keywords: Hakka, Ke-lang, Hoklo, Fujianese

** Date of Submission: November 13, 2019

Accepted Date: March 26, 2020

一、前言

1950-1970 年間，臺灣的史學研究，基本上是在史料學派觀點下，深受傅斯年等人的影響，認為歷史研究最重要的是盡量找材料，窮盡一切可能收集史料，把材料的內涵、關係講清楚，不要衍義。甚至認為史學便是史料學，基於從史料中取得的客觀知識，就能獲致堅實的歷史事實（彭明輝 2005：262；黃俊傑 2005：274；杜正勝 2004：114、166）。1970 年代之後，臺灣的史學研究在理論與方法上有明顯的改變，引入社會科學方法，造成社會史的興起，此期中，臺灣史的研究也開始發展。1987 年解嚴之後，除了臺灣史成為顯學外，生活文化史亦見勃興，使得歷史研究者的視野、研究進路、研究題材與方法更加多元，社會階級、性別、族群、邊界成了歷史研究的重要範疇（王晴佳 2003；林正珍 2005：69）。¹ 以 1983-1992 年間臺灣史碩士論文進行分析，可以看出 1980 年代之後，臺灣史的研究無論在品質或數量上都有明顯成長，研究目光不侷限於清代，研究主題從政治、經濟，轉而強調區域發展與族群關係（施志文 1994：442-444）。

從上述戰後臺灣史學的變化過程來看，以客家為主題的研究，是非常晚近才進到史學研究的範疇。但戰後以來，在學術殿堂以外，客家的相關論述其實一直存在。1962 年 6 月在苗栗創刊的《苗友》月刊（1965 年 2 月改版為《中原》月刊），即以「研究中原客家文化、闡揚客族先

¹ 黃俊傑（2005：288）認為，從 1971 年在臺復刊的《食貨月刊》及《思與言》雙月刊所載論文，明顯可看出以史學與社會科學之理論與方法結合的學術風氣的轉變。杜正勝（2004：11）則認為，最具影響力的學者是許倬雲，學術期刊是《食貨》，許倬雲提倡以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歷史，使社會史逐漸成為臺灣史學研究的主角。

民遺德」為宗旨，創刊以來，對於羅香林的客家論述、客家方言、客家的遷徙歷史、原鄉文史，乃至臺灣各地客家文史皆有涉及，是 1980 年代以前以客家為主題產出最為豐富的期刊。此外，1950-1960 年代，客家開始在《屏東縣志》、《苗栗縣志稿》等方志中顯影。1964 年外省客家郭壽華自費出版《客族源流新志》，表示欲以此書「發揚客族精神，也就是發揚中華民族精神」。1978 年陳運棟出版《客家人》一書，是戰後第一本由臺籍客家撰寫之客家專著，基本上仍是承襲羅香林的論述架構與內容（林正慧 2015a）。綜之，1950 年代之後的客家研究以探討客家源流與遷移歷史為主，旁及客家方言、民俗等文化特質。直至 1970 年代末，客家的相關論述，多未能超出羅香林論述的內容與觀點（莊英章 2019：42-43）。

臺灣學界研究客家，於 1980 年代以後略見規模，1986 年石萬壽表示，當時學界對臺灣客家歷史的探索才剛起步，相關論著不多，「除客家人自辦，但流通不廣的中原、六堆二雜誌外」，專書論文流通者，僅有松崎仁三郎的《嗚呼忠義亭》，連文希的二篇文章，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陳運棟的《客家人》等（石萬壽 1986：69）。尹章義於 1997 年回顧臺灣客家史研究時，相關的研究者除了北部的楊鏡汀、黃榮洛、黃卓權，南部的石萬壽，及建築學者的加入外，已可歸納為以莊英章、陳運棟為軸心，以尹章義為核心，及以師大史、地兩研究所互通聲氣的三個研究群。尹章義認為當時臺灣的客家論述以語言學的質量最佳，人類學、社會學量少而尚待努力，歷史學也是論述量少，且品質參差不齊。由於當時研究此主題的研究者不多，尹章義表示期待大批客籍

人士和青年學子參與，以豐富臺灣客家史的研究成果。²

1990 年代之後，隨著地方文化與族群意識的高漲，客家研究單位的相繼成立，客家研究由逐漸興盛已至蓬勃發展（莊英章 2019：42-43）。在臺灣，對於客家的研究，向來不是史學所專擅，其他學科如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地理學、建築學、藝術、音樂等領域的研究皆相當積極，成果也十分豐碩。與其他學科相較，研究客家的陣容中，以史學方法為之者顯得少數，大致看來，1990 年代之後與客家相關的研究主題以區域拓墾史為大宗，拓墾史經施添福於 1990 年確立清代竹塹地區以兩條新舊番界區隔出漢墾區、保留區、隘墾區三個人文地理區之後，土地拓墾史的研究在北部客家地域，又開拓出以墾區切入進行拓墾研究的新研究取徑（陳志豪 2008：71）。³ 拓墾史以外，主要的研究主題有閩粵關係（e.g., 林偉盛 1987；游振明 2001；吳正龍 2013）、義民身分與信仰（e.g., 謝宏武 1994；江金瑞 1998；賴玉 2001；蔡采秀 2004；陳雪娟 2007；賴玉玲 2000；張正田 2010；孫連成 2011；林欣宜 2014）、地權與產業（e.g., 陳秋坤 2004）、北客二次移民（e.g., 林秀昭 2007；柯光任 2012；林美珠 2015；王凱英 2015）、南客二次移民（e.g., 黃啟仁 2007）、家族史或女性史（e.g., 吳嘉賢 2010；陳嫻羽 2011；陳麗如 2011）、三山國王、三官大帝、伯公等信仰（e.g., 張欣儀 2004；田金昌 2005；杜立偉 2008；劉吏桓 2016）。⁴

就歷史研究而言，史料文獻是立論的重要基石；而以後見之明來看，

2 尹章義提到兩個檢證史學論述的標準：一是除非親歷目睹，歷史訊息的來源須交代清楚，不可憑空杜撰。其次，應多多少少呈現一點新的歷史「訊息」、新資訊或新觀點、新見解，而非雜掇成篇，人云亦云。這是研究或學術的最基本條件，但有關臺灣史的論述，多半達不到這兩項要求，臺灣客家史亦然（尹章義 1997）。

3 相關研究成果如簡志維（2005）；溫林文（2010）。

4 張欣儀（2004）；田金昌（2005）；杜立偉（2008：129-174）；劉吏桓（2016）等。

客家是晚近才形成的概念。但臺灣在戰後展開客家研究時，已普遍存在客家有著悠久的中原南遷歷史的成說。隨著研究的愈加深入，卻在歷史文獻中找不到客家，於是不少研究者開始反思何謂客家，進而重新認識客家。本文擬以客家之形成或形塑過程為主，除自身研究客家歷史的經驗外，並參照既有研究成果，觀察臺灣在戰後以來，以史學方法研究客家形成或形塑課題的歷程中，有何研究取向的轉變？除藉此了解客家研究的不同樣貌外，並參考不同學科的相關論述或研究成果，勾勒出「臺灣客家形成」的研究現狀，以及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二、迷霧中的起點

歷史研究，先是蒐集材料，常需在浩瀚的檔案文獻中，爬梳出一些難以捕捉的證據，再就所蒐集的材料加以考訂，從紛雜繁複的歷史事實做出必要的歸納與說明（Maza 2018：20；李劍鳴 2007：57；杜維運 1985：66；呂思勉 2002：57）。理論在歷史學中較不被強調，部分原因是此學科強調經驗的傾向，史學的訓練告訴我們，史料是史學的基礎，是史家認識和重建過去的中介，歷史不可能虛構，沒有史料，就無從談及治史（李劍鳴 2007：248；杜維運 1985：131；Maza 2018：21、340）。因此，歷史學的研究特色是大量運用史料文獻，研究清代需參考方志、宮中檔、軍機檔、外紀檔等相關奏摺檔案，或淡新檔案、岸裡社文書、官紳文集、報紙、族譜、古文書類、民間會簿帳冊等；研究日治時期，需參考官方檔案性質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土地申告書、鄉貫調查、各類戶口調查與國勢調查、統計書類、地方方志、要覽、報紙、

時人日記與回憶、族譜、民間會簿帳冊等；對於戰後的研究，官方檔案更加龐大，私人文書更複雜多樣，報章雜誌等亦均需依據研究主題，盡量查找參考，利用上述文獻史料，從土地開發、族群、社會組織、經濟情況、國家治理等觀點，探討其發展歷程與變遷。

對史學研究而言，無論是否採借社會科學的理論，或是採取田野調查、口述訪談等方法，也無論從事的是哪個地區哪個時代的研究主題，史料文獻是研究立論最重要的根據。這樣史學訓練而來的信念與研究方法，在遇上客家的歷史課題時，一開始的認知，客家是一個歷經五次遷徙，由中原北方逐步南遷的貴族世胄，隨著研究的深入，卻像走入迷霧森林，面臨許多問題：

（一）客家是中原南遷漢人嗎？

1930年代羅香林藉由《客家研究導論》一書建構了「五次遷徙說」，其所界定的遷徙過程、文化特徵等內涵，經過不斷的重述與強化，似乎成為不需要被挑戰的族群歷史與認同特質（洪馨蘭、莊英章 2018：4-5），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是研究者堅信不疑的主流說法。1989年陳運棟出版《臺灣的客家人》時，表示旨在介紹客家如何由大陸渡海來臺拓墾立業、生根發展的過程。與之前《客家人》較大的不同，是引日本學者中川學的論點，批判羅香林的客家源流論以人種論為出發點，難以擺脫民族自我心中偏見的陰影（陳運棟 1989：11-12）。2000年陳運棟對臺灣客家研究進行考察時，仍認為客家族群是漢民族中一個系統分明的支系，原居於黃河、淮河和長江流域，後遷徙紮根於閩粵贛邊的廣袤山區（陳運棟 2000：45），因此被認為是原鄉和重墾殖史的舊典範（蕭

新煌 2018：14-15）。

石萬壽並非全盤接受羅香林的說法，他認為五胡亂華及黃巢之役二事，為閩粵二省的河洛（以泉、潮、漳為主）、廣府（以廣州為主）二民系共有的來源，非獨客族所專有，認為南宋末至明初，為避暴元之政等因素，遷居嘉應州等閩粵交界山區的人氏，為客族的來源（石萬壽，1986：82，註2）。但仍認為客家源於漢人之南遷。尹章義則認為，「客家」一詞是由於南遷的中原族系和先住民區分的結果，或者和戶籍制度中的「客籍」有相當關係（尹章義 1991：279）。劉還月於 2001 年針對「誰是客家人」的提問，以江連貴的說法質疑羅香林，認為客家人並非中國人，而是來自亞洲大陸北部的蒙古民族，且是一個長期流浪的民族，不只是羅香林所稱的五次遷徙（劉還月 2001：1-3）。劉煥雲於 2003 年撰述〈臺灣客家學初探〉時表示，據羅香林的研究，客家人是中原漢族的一系，歷經五次大遷徙（劉煥雲 2003：128）。

綜上可知，戰後以來很長一段時間，在臺灣研究客家歷史，很難不受羅香林客家論述的影響，或偶有辯正客家並非純漢之說法，但對於悠久的南遷歷史似仍堅信不移。

（二）誰是最早來臺的客家人？

由於認為客家歷史源遠流長，早期研究者常欲探究客家何時來臺，以及誰是最早來臺的客家人等議題。在操作上，常以祖籍或方言為判別標準，套用在明鄭或清代早期文獻所記載的人群中，如尹章義認為鄭氏重用的汀州府長汀縣人劉國軒是早期來臺的客家人（尹章義 1991：266-269）。劉還月也認為，客家人最早較有規模的來臺，應是鄭成功麾下

的劉國軒部將及所率子弟兵，然因人數不多，對於客家聚落的墾拓並未產生太大影響（劉還月 1999：27，2000：80，2001：8）。劉煥雲亦稱，客家人東遷臺灣，始於明鄭時期，清康熙二十年代逐漸增多（劉煥雲 2003：130）。

尹章義嘗試說明荷鄭之前客人即已移民臺灣之謎，提及讀到猶太裔德國史學家 Ludwig Riess 於 1897 年寫的《臺灣島史》，「從中國大陸流浪而來的客家族，散住在臺灣島西部及平原的諸種族之間到十七世紀中葉，荷蘭人與臺灣島酋長之交涉卻由客家族當為翻譯，他們與中國人毫無差別。對臺灣物產與外國人之交易也盡了大力」。尹章義表示，Riess 未說明資料來源，故對於其所論述內容引自何處一無所知，但認為中文史料有蛛絲馬跡可尋，即粵東人（認為即為客家人）與海盜的關係。尹章義認為鄭氏與清相拒期間，始終盤據達濠港的邱輝是潮州府潮陽縣人，由於邱輝歷年活動範圍，遍及福佬語區與客家人散布區，認為隨邱輝東渡臺灣安插的潮惠和閩南客家人應不在少數（尹章義 1991：266-269）。

以方言為識別，認為明鄭時期的劉國軒是早期來臺的客家人，或以粵籍為識別，認為隨邱輝來臺者可能有客家，這其中，除了潮州府潮陽縣應非客方言地區外，更重要的是：其一，之後的研究發現，明鄭乃至清初，歷史上並不存在自稱為客家的一群人；其二，與粵東客方言地區相較，直至清代末年，汀州府人從不認為自己是客家人。

（三）為什麼歷史文獻中沒有客家？

以史學方法研究應該是歷史悠久的客家，面臨最大的疑惑是，為什

麼歷史文獻中找不到客家的相關記載？如尹章義曾表示，在編寫地方志書及研究客家的過程中，對於同治十年（1871）的《淡水廳志》，日治時代的《臺北廳志》和戰後的《臺北縣志》完全看不到客家人活躍在新莊平原的痕跡，令他感到「驚訝」，而在客家人居多數的新竹地區的方志中也找不到客家人，更覺得「不可思議」（尹章義 1997：2-3）。劉還月也曾表示，一般的志書中甚少提及客家史蹟，除了比較大規模的墾拓或民變事件外，多是語焉不詳的簡單敘述，「使得後人無法從清代的志書文獻中，看到客家人的墾拓、變遷與發展」（劉還月 1999：23、31，2000：4）。

研究者曾經的疑惑清楚地說明，號稱歷史悠久卻在文獻中找不到具體記載，是研究客家歷史最感匪夷所思的難題。這樣一個疑惑，先促使研究者設法從文獻中可能的線索尋找客蹤，之後更成為不得不回頭思考到底何謂「客家」的主要原因。

（四）清代文獻書寫中的「客」是客家嗎？

羅香林追溯客家歷史的方式之一，即是在宋元文獻的書寫中找「客蹤」，於是五代時期的「給客制度」、宋元文獻中的「客戶」都被認為可能是客之歷史痕跡。受羅香林影響，連文希也引《唐書》食貨志、宋代《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中對「客」的記載，追溯客家的播遷沿革（連文希 1972：1）。由於史料文獻中沒有客家的明確記載，早期研究臺灣的客家歷史，多以「客」之書寫追索客蹤，逕將文獻中記載的「客」直接認定為客家。如尹章義表示，康熙末年方志中頻繁出現的客之書寫中，「客」非僅「客籍」而已，不論是客子、客莊，皆是指客

家人（尹章義 1991：279-280，1997：2-3）。劉煥雲亦以客之書寫為客家，甚至認為，客家人來臺開墾之初，並不是因來臺作客而被稱為「客人」，而是因為其在原鄉本來就是客家人之緣故，保有其獨特的客家話和客家文化（劉煥雲 2003：130-131）。

在羅香林時代以「客」之書寫尋找客蹤，有點像是王明珂所謂的民族溯源研究法，在歷史材料中爬梳有關「某民族」的資料，找尋某一民族為標記的人群的語言、體質和文化特徵，以及在歷史上的活動。但這樣的取徑，從某種角度來看，常是一種主觀上反映及詮釋當前族群狀況的工具。王明珂提醒過，民族史料中關於本民族或他族的文化特徵、族稱、族源的記載，反映的經常是對當時族群關係的詮釋，不完全是「歷史上的事實」，比較像是在體認到民族命運的挫折後，歷史學者以重新詮釋本民族的族源，期望民族復興的努力（王明珂 2005：91-92、102）。換言之，這些記載應該是被研究的材料，而不是不辨自明的歷史事實。客家研究經過很久之後才發現，民族所有的政治、文化和情感力量，都是晚近歷史上發展的結果，之所以有深厚歷史根源這種假象，要拜長久以來中西不同論述的創造所賜。換言之，無論是以「客」之書寫尋找客蹤，或是所謂的中原漢族五次南遷的歷史，都是羅香林在他的時代面臨所處環境所做的族群建構的方式與內容，但在臺灣開始進行客家研究時，卻被認為是重要的歷史知識與可依循的研究方法。

（五）清代文獻書寫中的「粵」是客家嗎？

除了「客」之書寫外，在臺灣客家歷史的研究中，「粵」之書寫亦常被認為是客家人的歷史名詞。連文希即認為文獻上的「粵」等於客家，

表示明鄭時代雖有若干粵東的客人，曾跟隨鄭氏的部隊入臺，惟其人數究竟不多，其後且被清廷遣散回籍。論述清代臺灣客家人之流佈時，亦是以清代文獻中的粵、潮之書寫為線索（連文希 1972：3-14）。石萬壽的研究十分注意史學家的考證工作，認為客家人入臺開墾歷史不是明鄭，或康熙二十五、六年，認為應是施琅卒後的康熙三十五年後。但是對客家人的開墾過程與分布，亦是以客、粵之書寫為主。尤有甚者，認定「粵」為客，並指杜君英是「粵客人」（石萬壽 1986：71-72、75）。

除了文獻書寫，劉還月以田野調查客家足跡時，也常以「粵」為線索，從廣東的地名如彰化的饒平厝、詔安厝、海豐寮進行田野調查（劉還月 1999：31-36）。這個部分，施添福曾表示，田尾鄉境內的海豐、陸豐、饒平厝，客家語可能原本就不是他們的語言，他們是來自與閩南文化更相近的一個地區（施添福 1998：14）。

以「客」、「粵」之書寫視為客家，原本被認為理所當然，似無疑義。但透過更多的史料爬梳，逐漸浮現與之互斥的有力證據。如康熙末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明明清楚地表示，「潮屬之潮陽、海陽、揭陽、饒平數縣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而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則又有汀州之人自為守望，不與漳、泉之人同夥相雜。」（收入王瑛曾 1962：343-344）。顯示閩籍與粵籍之中均存在兩種不同方言人群，且有跨省結合的情形。再參照同時期藍鼎元的記載，他將覺羅滿保所稱「潮之海陽」，且與「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則又有汀州之人」對立的杜君英稱為「傭工客子」（藍鼎元 1958：6），進一步顯示，當時在這些官方眼中，「粵」的人群意涵的確等同於「客」，其中卻存在著不同的

方言人群。若如是，我們還可以直接將文獻書寫的「客」、「粵」直接認定為客家嗎？

「客」、「粵」之書寫視為客家的立論基礎於是逐漸鬆動，進一步促使治史者反思，就歷史文獻的層面而言，到底何謂客家？

(六) 清末華南的客家論述臺灣可以通用嗎？

薛雲峰曾表示，依據《清穆宗實錄》載「新寧縣東西兩路客家勾結匪類焚掠廣海寨」，以及光緒末年《嘉應州志》載「近從汀贛遷自宋元，語多古音，聲合中原漢唐，土著不聞，僅存稱曰客家，為客家言，志方言第七」，「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或 1912 年劉錦藻言「嘉應……言語與粵不同，人稱之曰客家話云。」認為由此三段文獻，可知至少在 19 世紀中葉迄清帝國結束止，「客家」一詞不但用來指涉特定族群的身份，還說明這個族群一貫使用的語言叫「客家話」，因此認為清代文獻中的「客」，沒有理由不被視為「客家」或「客家人」（薛雲峰 2009：51-53）。

然而這樣的說法無法說服的是，19 世紀中葉以降華南的事例，可以適用於 19 世紀以前的臺灣嗎？進而類推認定清代文獻中的「客」為客家？

(七) 19 世紀西人的 Hakka 論述是臺灣客家嗎？

薛雲峰表示，從 19 世紀西洋人的紀錄中可以清楚看到，外國人都稱臺灣客家人為「Hakka、Hakkas、Hak-kas」，從未把客家人簡化稱作粵人或廣東人，可知「客家」和「福佬」的分類早已是臺灣民間社會的

常態而被西洋人所紀錄，由此認定「客家」作為客家人的自稱詞或其他族群的他稱詞，以及做為一個「族群」的歷史事實，最遲在 19 世紀的臺灣已經出現（薛雲峰 2009：51-53、63）。然而，這樣的詮釋必須面臨一個現實的挑戰，如果「客家」作為客家人的自稱詞或其他族群的他稱詞，以及做為一個「族群」的歷史事實，最遲已在 19 世紀的臺灣出現，為何中文文獻中遍尋不著客家身影？

（八）日治時期種族分類中的「廣東」是客家嗎？

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殖民政府將臺灣漢人種族分為福建與廣東，以往的客家研究中，多直接將調查資料中關於種族別的「廣東」直接稱為客家，如潘孟鈴（2000）表示，戶籍資料的廣或福，為客家與河洛，或客家籍與河洛籍。王慈韻（2012：18）表示，在研究方法上，將登記為廣者，視為客家族群統計。林佳締（2012：91）表示，日治戶口調查簿中，種族的記載，廣代表廣東人，俗稱客家人，福代表福建人，即河洛人。

若前述清代之「粵」等同於客家的立論已出現疑義或鬆動，而日治時期的廣東人會是客家嗎？或者應換個問法，是經過怎樣的機制與變化，讓「廣東」到了日本統治時期可以等同於客家？

（九）三山國王是客家的移墾指標嗎？

尹章義於 1985 年的研究，認為漢人移墾臺灣初期，閩粵尚能合作共墾，待墾地開發殆盡，因群體意識高張逐漸產生衝突與對立，文中以「吾潮合郡之福神也」認為三山國王信仰是粵東潮州府轄九縣客家人之福神（尹章義 1985）。劉還月也表示，三山國王廟是他田野調查找尋

客家人的線索之一（劉還月 1999：31-36）。簡炯仁等人在撰寫《高雄市客家史》時，亦將三山國王信仰視為追蹤客家人移墾的指標（簡炯仁等 2009：17）。

以三山國王信仰視為客家移墾指標，可能繫因於認定「粵即客家」的誤解。經由更多的田野與研究，已逐漸發現這樣的認知可能並非歷史事實，如邱彥貴（1992：66-70）早在 1992 年就認為將三山國王視為臺灣客家特有信仰的論述並不完整，施添福（1998：15）亦以其田野經驗表示，三山國王不是指認客家的可靠指標，或如林本炫（2011：142-144）基於苗栗縣的調查經驗表示，過去認為三山國王是客家人特有信仰的說法已經受到質疑，在苗栗地區反而是關聖帝君、義民爺、三官大帝和神農大帝的信仰較為顯著。另如杜立偉（2008：133-144、159）表示，三山國王信仰應從屬地（粵東）的視野來解讀，而非從屬人（客家人）的角度來分析，以三山國王信仰視為客家移墾指標實係忽略原鄉地區的族群屬性與分佈情形，及簡化族群的類別所造成的誤解。

綜上可知，早期對客家既有的認知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南遷民系，因此，史學研究客家歷史，面臨最大的難題是如何認知、論述這個不曾出現在清代或日治時期文獻中的客家？就既有的研究成果來看，若研究主題不涉及客家意涵，可以不逕稱客家，直接以文獻上的粵籍、粵民表述，如與拓墾相關，尤其是北部沿山一帶與隘墾相關者、或如清代閩粵關係等。若研究主題或論述內容特意舉出客家，則在操作上多以原籍地之方言為依據，將福建省汀州府，及廣東省嘉應州、潮惠移民視為客家。就如此以原籍地識別方言人群的方式展開研究，先是接受成說，後稍作調整，卻始終面臨文獻扞格不入的疑慮，好像在迷霧中摸索。

然而，基於對史料的重視，文獻上僅是粵，或是與戶籍意涵相近的客之書寫，愈來愈難以說服治史者，清代或日治時期臺灣真實存在過自稱客家的一群人。現實認知與歷史文獻的落差，是促使治史者始終繫念究竟何謂客家的主要原因。此外，客家形成過程未釐清之前所累積的研究成果，終究顯的零散而片斷，以致到了 2011 年有學者表示，「對於原鄉客家開墾臺灣的歷史過程以及究竟什麼是臺灣客家的真貌，非但沒有得到全面性理解，反而浮現出更多的質疑」（丘昌泰 2011：序）。對歷史研究者來說，一切的困惑還是得回到歷史文獻中找答案。

三、解構後的重新認識

1998 年，施添福呼籲大家應該思考「什麼是客家」，他明白表示，這個問題，「說來可能荒謬，但一直困擾我」，認為釐清「什麼是客家」，是今後客家研究應優先處理的根本問題（施添福 1998）。1999 年，羅烈師（1999：118）表示，客家學的關鍵問題不是客家特質的問題，而是「哪些力量在界定客家？」也就是客家如何形成的問題。2000 年，陳運棟（2000：76-77）也表示，客家研究不能僅僅侷限於源流與方言，更不應糾纏於客家源流中無從查清的部分。逐漸地，對於客家的研究，學界關注的重心由源流的論辯轉向究竟何謂客家，以及客家如何形成而來。

人類學界如高怡萍於 2004 年即發現在閩西、贛南一帶，只有清代從粵東遷入的才自認為是客家人，其餘的雖然講相同或類似的方言，但都自認為是本地人。許多「客家人」從來都不知道他們叫做「客家」。

以及引梁肇庭的研究表示，客家族群論述發軔的地點不是發生在號稱客家大本營的閩粵贛邊區，而是在離散客家與廣府本地人的族群邊界（高怡萍 2004：195-196、200）。2006年羅烈師（2006）以「臺灣客家之形成」為題，依據 20 世紀初日治時期的漢人鄉貫調查與戶口統計資料，以河流模式解釋竹塹地區在清代如何藉由義民信仰，逐步確立「粵人認同」，並在 20 世紀初進一步以粵人為界限，將粵人認同轉化為「客人論述」。

由此可知，對於客家的研究，學界已傾向不再糾結於源流的探討，轉向了解客家的形成，而此也是近年來史學界十分關切的課題，如 2010 年張正田（2010：10-11、17-22）欲釐清苗栗後壠、西湖二溪流域義民信仰不興盛的歷史原因時，認為若不從根本釐清臺灣客家形成的歷史，很難真正觀察臺灣客家認同與義民信仰之性質。歷史研究者基於治史的學術訓練，面臨現實認知與歷史文獻的落差，促使許多治史者在研究過程中，想先致力於解決此一困惑自己到可能難以為繼的大哉問。就史學研究而言，近年來設法處理何謂客家，或客家形成等課題，約從以下幾個面向切入：

（一）釐清客之書寫的意涵

史學研究客家，從全盤接受文獻上客、粵之書寫即客家，進而產生質疑，並嘗試重新回到歷史脈絡了解文獻上客、粵之書寫的實際意涵。如林正慧（1997：15、194）認為，文獻中「客」之書寫，一直以來都只是官方或漳、泉移民的他稱，是當時官員或閩人以粵人隔省流寓，故稱其為「客」，乃以省籍差異使然，不必然以方言為判定的標準。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文本，長期以來一直被學者們視為「講客家話的

客家人」之歷史，並據以重建清代臺灣的客籍源流、漢人祖籍分布以及拓墾社會。然李文良（2003：141、148）由清初方志中客之書寫，同時看出書寫者與被書寫者的人群意涵，他指出，清初臺灣縣級方志提及的「客家」，雖然指的都是具有潮州府籍及佃戶身分的同一群人，卻未必意味著他們是一群內部具有同質性的人。並認為文獻的「客家」書寫映照出來的不是客家人的問題，而是握有書寫權的那一群「非客家」的閩籍地方官員對臺灣社會可能產生不安定的緊張感。

文獻中的客之書寫，除了透露出書寫者與被書寫者的不同意涵外，由主客的相對來看，所謂的客，亦存在不同層次的人群指涉，如林正慧（2006：1-61）指出，清代臺灣史志中的「客」，所指涉的人群內涵有兩個不同層次，其一「客」係別於土著，故閩粵皆「客」；其二則是別於土著皆為客之閩粵移民中，復因省籍不同而分別出閩主粵客，此兩種不同層次的「客」之人群意涵，都不宜直接等同於客家。

從1998年呼籲解決「何謂客家」問題，歷經十餘年後，施添福⁵表示「惶恐與尷尬的心情」依舊，為了廓清久存的疑惑，2010年起，⁶以「從『客家』到客家」為大標題，企圖從分類學、發生學和地域社會

5 施添福原係地理學出身，1961年，以第五志願考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最後一屆的史地系，原本想讀史學，經當時史地系代主任劉衍淮之鼓勵，改以地學為專修，但後來逐漸採取整合地學與史學的方式，1987年出版之《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一書即為此道路的起點。1998年開始以歷史地理學看客家研究。除了北部的三層制外，後來其對客家的研究方法，已幾近歷史學的操作手法（施添福1987：viii）。

6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一文，於2010年12月、2011年年2月，先以「一個族群稱謂的歷史性與地域性分析」為副標，發表於國立交通大學主辦，「臺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及中研院臺史所專題演講。2011年9月，以「從『客家』到客家（二）：客家稱謂的出現、傳播與蛻變」為題，發表於中研院臺史所主辦之「第三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2013年6月，以「從『客家』到客家：臺灣的客人稱謂和客人認同」為題，發表於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主辦之「族群、社會與歷史：臺灣在地研究的實踐與開展：莊英章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施添福2014a）。

的角度，探討從「客家」到客家的歷史演變過程，釐清客家名稱的歷史性和地域性。為了回答「什麼是客家」，其從魏晉以降之文獻中梳理出本貫主義「客家」之脈絡，用力之深，令人敬佩。他認為，中國自魏晉到明清，在傳世文獻中所見各種客稱，基本上都是依據戶籍制度的本貫主義所界定的「客家」，並非作為民系或族群名稱的客家。自清中葉以降才逐漸從本貫主義的「客家」向方言主義的客家轉移（施添福 2013, 2014a）。

以往文獻中「客」之書寫，常被直接援引為客家的歷史文獻，但近年來史學家重新解讀這些文獻中的「客」之書寫，已大部分還原「客」之書寫原本具有之他稱，或本貫主義屬性的客籍意涵，也在此基礎上，可更細微地看出清代臺灣的客或粵之書寫，實含括不同方言人群，以及華南在 19 世紀曾有本貫主義的「客家」向方言主義的客家轉移的現象。

（二）釐清清代省籍與方言界線不一致之現象

對於以往習將清代臺灣文獻上的粵、客混用的現象，林正慧指出，需留意清代來臺漢人之省籍與方言群界線是縱橫兩條界線，分隔出四個不同組合的人群屬性，省籍與方言的認同作用，可能依時依地更依族群勢力而有所不同（林正慧 2005）。除了省界與方言界線交錯的情形之外，也需注意閩客方言交界地域互為影響的現象，如福建省閩西汀州與閩南漳州的交界地區（龍岩到南靖、平和、雲霄、詔安），及廣東省在嘉應州與惠州、潮州的交界山區地帶（如饒平、揭陽、揭西、陸豐、陸河、海豐三縣北部山區）。其方言屬性的追溯，可能必須到村庄的層級，方能正確分析其可能的認同，也需留意上述雙語交界地帶的居

民在原鄉與其他方言人群的互動經驗，對其來臺後認同選擇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林正慧 2015a：149-154）。

（三）探究 19 世紀中葉西方人與 Hakka 之關係

林正慧與施添福不約而同地認為，欲釐清臺灣客家形成，必須先將眼光轉向華南，釐清華南客家形成的脈絡，在此研究取徑中，必須觸及清中葉後廣、肇一帶的土客紛爭，以及西方勢力進入中國華南後，以 Hakka 概念認識客家，並共同參與為客溯源的過程。如林正慧（2010，2015b：107-160）指出，西方人對客家的認識和探究始於近代來華的傳教士，尤以巴色會傳教士為主，且至少在 1850 年代前後，在華南的西方人已確立了以 Hakka 稱述客方言人群的法，而客方言人群本身，似乎也已用「客家」一詞來指稱自己。施添福（2011；2014a：1-114）透過中西文獻的梳理，更明確地表示，作為現代族群名稱或方言群名稱的客家一詞，主要源於 19 世紀中葉以後由西歐傳教士依據方言主義所鑄造的「Hakka 客家」標記，再透過傳教活動及相關論述散播滲透，成為日後羅香林得以方言主義概念提出客家民系的重要根據。

此外，林正慧（2015b：107-160）發現 19 世紀中葉以後來臺的西方人，因受華南 Hakka 認知的影響，來臺後亦開始以 Hakka 描述臺灣的客方言人群，有別於在此之前皆以「閩粵移民」表述之內容，揭示了 Hakka 一詞在臺灣的外來性。施添福（2014b：88）的研究則發現，由於在臺傳教士多未能學習客語，以致自晚清至日治，Hakka 一詞始終只出現在西文書寫的文獻中，而未能進入臺灣社會。

(四) 關注華南客家形成的脈絡

對於華南客家形成的關注，唐立宗由方志著手的研究，也獲致許多重要的發現，如就《石窟一徵》來看，其長期被學者視為研究客家文化必讀的重要文獻，或是客家方言研究之前驅，但若回歸於《石窟一徵》的文本，只能說是作者黃釗出於愛鄉的理念，強調本邑的風土文化，但尚未見有提昇「客家」的歷史文化目的。另就光緒《嘉應州志》來看，唐立宗認為，在廣東方志書寫中，方言分類由來已久，但直至光緒《嘉應州志》的出現，「客家」意識才形成想像的實體概念。且從 20 世紀初客家學者熱衷編修志書的表現來看，顯示了他們正嘗試從方言、種族、文化風俗等面向建構客家論述，藉以駁斥過去指客為非漢的誤解（唐立宗 2002，2005）。

施添福（2014a）則關注華南土客關係對客家形成的影響，藉由處理明中葉以降廣東惠州府和廣、肇兩府的移民史，了解這些地區的土著對異邑移民稱謂貶義化的過程。認為方言主義的客家名稱，原是廣、肇兩府的土著，依據本貫主義的分類標準，用來稱呼異籍或異邑的移民，原本賦予卑賤的意義，經 19 世紀中葉由西方傳教士按照廣府方言的發音，以羅馬字拼寫成「Hakka」後，再將 Hakka 依方言特色重新定義為客家後，才回歸中性的人群分類意涵。

前述唐立宗的研究，看出了嘉應州地區客家意識的形成並非由來已久，施添福的研究則指出各類客稱或「Hakka」一詞中人群意涵的變動現象。林正慧對於華南客家形塑過程的研究則認為，應分文化共性形成、客方言群意識覺醒兩個階段來看。僅有文化共性難已宣告客家形成，因為僅有文化共性，並不能解釋該方言人群以「客」為名的形塑過

程。華南的客家最先發生於閩粵贛邊區客方言人群向惠、廣、肇各州府外移面臨不同程度的土客衝突的時空脈絡中，之後隨著西方傳教士的為客溯源，及林達泉等人為廣肇府客民感同身受的相關論述，漸為中心客區所接受。由光緒末年溫仲和所纂《嘉應州志》之「客家論述」內容可以看出，嘉應州士子們以徵引宋代文獻的方式，完成一套自己是「客家」稱謂緣起的論述，客家論述也因此逐步完成由邊緣客域回流中心客區的過程（林正慧 2015a：29、68-72、88-91）。

（五）日治時代福廣種族之人群意涵

為了了解臺灣客家的形塑過程，除了將研究視角擴至華南地區，亦將研究的歷史時期，由清代延伸至日治，乃至戰後。如陳麗華（2011：12）的研究指出，日治時期因殖民政府帶有種族觀念，將清代的閩、粵的籍貫概念轉化為「閩族」、「粵族」或「福建族」、「廣東族」的族稱，並將之改造成在風俗、語言、文化方面有差異的種族概念。林正慧亦（2015a：302-303、314-315）發現，日本領臺之初，可能源於 1874 年征臺之役，或是受華南與西人相關論說的影響，多以「哈喀」、「喀家」或「客家」標誌。後來經過實地與舊慣調查，改使用清治二百多年一直沿用的閩粵籍別，卻將方言分類與省籍界線疊合，賦予閩粵二籍各有對應之方言與風土民情的認知。換言之，日治習以福建、廣東二族為臺灣漢人之分類，表面上看來是沿襲清代的省籍框架，但其人群意涵已然不同。關於這個部分，施添福（2014b：44、48）也表示，明治 38 年（1905）實施第一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時，正式確立以廣東、福建作為本島漢人種族和語言的分類名稱。由於調查當局缺乏為種族和語言提供

清楚明白的定義和區分，致使種族的意涵摻雜了原籍地和語言的分類標準，變成既非純粹的原籍地，亦非純粹的方言分類。在這樣的操作定義下，使種族偏離原本設計作為識別臺灣漢人「原籍地」的意義，在概念和實務上，反而更加接近依方言分類的語族標記。

（六）釐清「客家」一詞的外來性

除了釐清客家之形成並非由來已久，研究者也發現「客家」一詞對臺灣而言，亦非本土生成，而是外來用語。如陳麗華（2011：1、9）指出，「客家」觀念並非源生於臺灣社會，而是 19 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臺灣開港，由西方人從東南亞和中國沿海地區移入，其後，日本殖民者改以籍貫的「廣東」作為該種族的名稱，對於臺灣地方社會的人而言，「客家」其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外來詞，或如施添福（2014b：1、35）亦稱，廣東人、粵人和客是臺灣民間社會通行的族群名稱，而客家不是臺灣歷史上固有的名稱，也不是一個自臺灣民間社會孕育而成的自稱或他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外來詞。

林正慧（2015a：500-502）的研究顯示，從一些日記或檔案資料可以看出戰後臺灣的客方言人群，不僅經歷了由「日本人」變成「中國人」，也同時由「廣東人」變成了「客家人」。臺灣客方言人群一直要到了國民政府統治時，才開始與中國華南客家採取同一識別標準，自稱為客家人，且在接受「客家」稱謂的同時，嫁接起中原南遷的族群歷史。之後隨著 1949 年國家中心的移臺，臺灣的客家形塑在民族主義的重重包圍下，循著中原客家的意念，很快繼承了原本位於華南「中心客區」的位置。戰後以來在臺灣進行的「中原客家」論述，以及外省客家

與本省客家的互動，讓中原客家文化質素得以雜揉融合，但是由於中原客家的宣揚，其實是鑲嵌在符合國家政策的脈絡底下，充滿工具性與被動性，逐漸導致客家族群處境的劣勢化與客語的隱形化，此一隱伏的矛盾，成為日後臺灣客家人意識發軔的重要因素。

綜觀近年來史學研究客家形成（或形塑）課題者，基本上有一些共同特色：

1. 皆本於史料文獻的解讀，雖與前行研究者使用相同的史料，但由於是從研究客家形成的目的出發，觀察角度的改變，讓研究者從史料中解讀出不同於以往的豐富意涵，看出過去忽略的重要線索。如族譜中看到粵省福佬對日治時期被迫成為福建人的無奈，「我等常用閩南語而籍隸於粵東者，竟搖身一變而不自覺地，承認為『福建人』，事之可扼腕兼涓嘆……」（陳朝海 1984：2）。或是族譜中「祖籍：福建省漳州府饒平縣」的記載，其實不是誤植，也是閩省福佬被迫成為福建人的歷史痕跡（〈胡氏系統圖〉（不著撰人 nd））。就如美國西北大學歷史學教授莎拉·瑪札（Sarah Maza）所言，「你會找到什麼東西都是來自於你所提出的問題」，尋找到令人驚詫的史料通常是饒富新意的研究之結果，而不是其原因（Maza 2018：243、257）。

2. 皆採貫時性的觀察，多將研究視角貫穿清代、日治、戰後三個不同國家政權統治時期，觀察國家力量下人群的肆應樣態；

3. 皆採跨域性的觀察，由臺灣客家出發的研究，無可避免要先了解華南客家形塑的歷程，再將視角轉回臺灣，進而理解客家論述在華南與臺灣兩地流轉的過程；

4. 重視西方勢力的影響，皆注意到 19 世紀中葉後西方差會，尤其

是巴色會傳教士對 Hakka 形成與溯源的影響；

5. 皆嘗試與不同學科對話，如受人類學影響，歷史學開始注意文獻中的表面字義下的自稱或他稱的不同意涵，原本看似平凡的史料得以有不同層次的解讀。此外多少受到人類學或民族學族群邊界理論的影響，如李文良認為，透過文獻的「客家」書寫所要對照出來的，可能不是客家人的問題，而是握有書寫權的他者所面對的問題（李文良 2003：149、155-156）。又如陳麗華（2011）〈談泛臺灣客家認同〉一文即緣於懷疑王甫昌指出臺灣客家認同興起於 1980 年代，是現代政治環境下新的族群想像的說法。誠如施添福（2014b：8-9）所言，王甫昌對於泛臺灣客家認同的解釋，顯然沒有被歷史學界接受，才帶動不少學者追溯臺灣客家認同意識及客家族群和社會建構的歷史根源。

綜上可知，史學遇到客家，在很多源流論述與看似年代久遠的文獻史料中迷途了甚久，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逐漸解構成說而重新認識華南與臺灣客家形成（或形塑）的脈絡。經過這一段由解構而重新認識的過程，也深刻體會對於客家此一研究課題，歷史文獻或史料並非不辨自明，史料不會自己說話，如果不回到歷史發生當時的時空去體會，如果不理清歷史發展的脈絡，而受到既有成說或自己主觀認定的影響，即使是立基於看似豐富的史料，但所獲致的詮釋或論述，可能不是歷史的事實，而是以今識古的誤解。

四、持續的對話與探究

回顧以往，從片面認為廣東即為客家，福建即為福佬，到目前學界已大致了解來臺漢人中，以省籍與方言界線可以略分為四種組合的人群（如下圖），於是以往被忽略的閩省客方言人群與粵省閩南方言人群，逐漸也成為學界重視的研究課題，對汀州移民的研究發現，在依附粵籍或者隱身漳泉族群之外，其實仍有維持祖籍認同的選項（鄧楨燁 2015）；⁷ 對屏東平原廣東福佬的研究發現，雖然韓文公和三山國王信仰是廣東福佬人與客家人的共同特色，但二者背後體現的語言群體卻截然不同（陳麗華 2013；吳中杰 2007；莊青祥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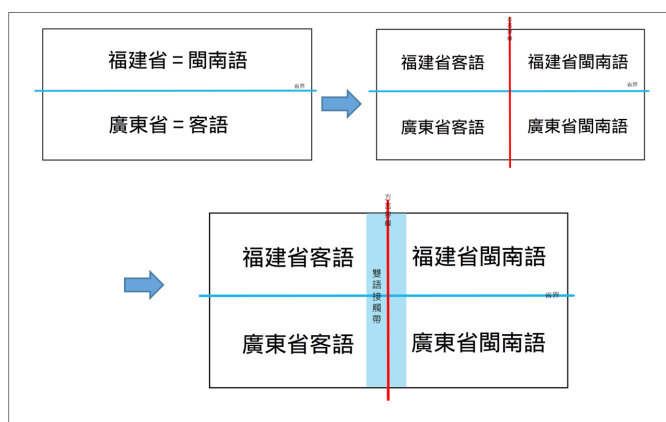


圖 1 省籍與方言界線下愈來愈豐富的人群意涵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⁷ 另外與汀州移民相關的研究尚有賴文慧（2009）、黃詩涵（2011）等。

前文曾言，史學在研究清代臺灣客方言人羣時，已注意到閩粵二省與方言交錯的區域中，在福建省汀州與漳州交界處，以及廣東省在嘉應州與潮、惠二府交界山區，各存在閩客語接觸地帶。針對這個研究課題，地理學的韋煙灶及其學生為主的研究群自 2008 年開始，陸續調查各地區世居宗族空間分布，利用閩客式地名，繪成福建、粵東歷史方言分布地圖，並在閩客語接壤的方言過渡帶，畫定一條兩側各 5 公里「語言弱界線」（韋煙灶等 2009：1-22；李科旻 2013：1；韋煙灶 2011：1-3，2013a：82-83，2013b：53-54；韋煙灶、曹治中 2013：54-55）。韋煙灶認為，此閩客語歷史方言分區圖，可用以辨識清代臺灣漢人渡臺之初的族群歸屬，逐次解開過去臺灣閩客各社群的分布與互動的含混之處（韋煙灶 2013a：82-83，2013b：55）。

地理學者對雙語區的研究，已能確認到縣層級以下，進而發現以往片面將廣東、潮州、詔安等原籍地視為客家的謬誤。韋煙灶表示，許多人忽略粵東存在為數眾多閩南人的事實，就會出現許多似是而非的論點，一步錯之後的推論就步步錯（韋煙灶 2010：65）。該研究群以閩客語歷史方言地圖糾錯的事例不少，如將原籍廣東省潮州府海陽縣文路鄉的卓姓視為客家人，其位於粵東閩南話區，應屬潮州音系閩南人（林雅婷 2012：4）。又如彰化縣埔心鄉與永靖鄉涂姓被諸多研究者被當成是饒平客家裔，其祖籍為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烏嶺鄉（今饒平縣東山鎮湖嶺村），位處偏向潮汕閩南話區的閩、客話交界地帶，從地名發音轉換過程，涂姓入粵之前的祖籍為純閩南語區的漳州府漳浦縣，故可推測該涂姓家族渡臺之初應歸屬閩南族群（韋煙灶、曹治中 2013：58-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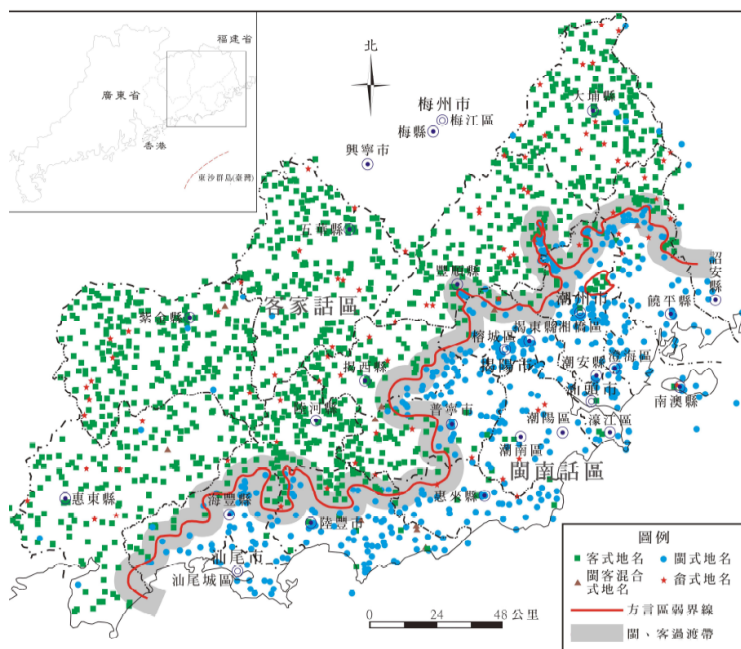


圖 2 廣東閩、客歷史方言分圖

資料來源：林雅婷（2012：31）。

在漳州詔安客方面，韋煙灶表示，某些研究者往往陷入「祖籍詔安即是客」的謬思，對特定非客裔的研究對象，亂安族群身份（韋煙灶 2013a：90、109）。他利用詔安客原鄉與渡臺宗族族譜對比，彙整《詔安縣地名志》所列姓氏、聚落地名及所使用方言等資訊，建立了清晰的詔安閩客界線。據其研究，詔安只有二都是客語區，其餘各都為閩南話區。詔安二都為一個完整的地理區，其區域分三個盆地：秀篆、官坂—霞葛、太平，地理形勢略顯封閉性，初設之時「地廣人稀」，極可能在設置時仍屬畚民族的生活領域。漢人入墾詔安二都的年代可能是從明

初至中葉期間，移出區主要為廣東潮州府大埔與饒平縣，福建漳州府平和、雲霄等鄰縣，汀州府永定縣。認為過去研究者將祖籍為詔安縣五都親營鄉的石門區望族潘姓與祖籍為詔安縣五都西埔墟的朱姓世居宗族認為係福佬客（客底），但以此詔安閩客界線來看，石門潘姓與朱姓為「客底」的可能性很低（韋煙灶 2013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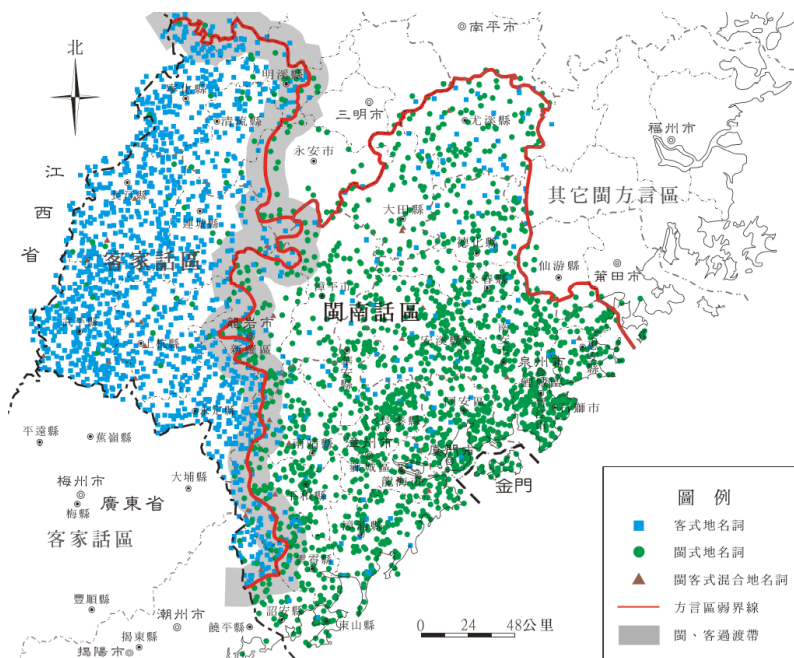


圖 3 福建閩、客歷史方言分圖

資料來源：林雅婷（2012：28）。

除了更細緻地釐清閩客雙語區的族群屬性外，韋煙灶研究群以該歷史方言分布地圖為基礎，在臺灣各地展開以世居宗族為主的閩客分布研

究。韋煙灶、曹治中、林雅婷、張智欽、葉佳蕙等人的研究發現，新竹的新豐及桃園新屋、觀音、楊梅等鄉鎮有一群祖籍粵東且操偏漳系口音閩南話及海陸腔客話兩種語言的社群，他們被當地福建籍移民稱為「半福佬客」，這群半福佬客大多以閩南語為母語，長久受周圍海陸客影響而逐漸客化。且這群半福佬客作為當地閩（沿海）與客（內陸）之間的溝通橋樑，有助於緩衝閩客間衝突性，及製造一個相對族群和諧的社會空間（張智欽等 2009；韋煙灶、葉佳蕙 2010：37；韋煙灶 2010：64；林雅婷、韋煙灶 2010；林雅婷 2012：3；韋煙灶 2013b：53-54），如清代的大溪墘庄與新竹紅毛港由於有「半福佬客」等雙語社群的存在，而成為族群互動及方言的緩衝地帶，因此極少分類械鬥發生（韋煙灶、葉佳蕙 2010；韋煙灶、林雅婷 2013：51）。

由上可知，歷史愈究明，愈能發現其中更豐富的樣貌。即如施添福所言，釐清了「什麼是客家」，可以開拓一些新的視野，加深和加廣客家學的研究內涵（施添福 1998：16）。

史學研究客家的形成（或形塑）至目前為止，已獲致大致的共識，陳麗華（2018：302）認為，研究者對清代的粵、客，至日治的廣東種族、粵族，到戰後的客家人，已有約略一致的看法，只是對其演變的機制有不同的理解。施添福（2014b：13）亦曾盤整近年來學界對於臺灣歷史上客家稱謂的演變（如下表），乍看之下，似乎歧義不大。

表 1 臺灣歷史上客家稱謂的演變

	清朝時代	日治時代	民國時代
王甫昌 (2003.12)	過去의 客家認同	過去의 客家認同	泛臺灣客家認同 (1980 年代以後)
王甫昌 (2005.06)	---	廣東人 (系)	來自廣東、祖籍廣東
詹素娟 (2005.12)	粵	廣東種族	---
羅烈師 (2006.03)	粵人認同 客人認同	---	客家
陳麗華 (2011.12)	Hakkas 客家	廣東種族	客家
葉高華 (2012.12)	客民	廣東人	客家人
林正慧 (2013.01)	粵人 客人	粵族、廣東族 客人	客家人
陳麗華 (2013.03)	粵籍	廣東種族	客家人

資料來源：施添福 (2014b：13)。

但細究各人的論述內容，實仍存在某些差異。人類學出身的羅烈師表示，就 19、20 世紀之交的竹塹地區來看，省籍認同的力量顯然超過族群認同（應指方言認同），認為省籍認同是當時臺灣人群聚居的主要原則，族群認同則為輔助原則（羅烈師 2003：152-153）。其所勾勒的客家形成過程是，當代臺灣客家現象係建立在傳統祖籍人群分類，尤其是成熟於 19 世紀中期的粵人認同基礎之上。認為在臺灣特定的政治經濟背景下，竹塹地區的地方士紳藉由義民信仰塑造粵人保莊衛國的忠義形象，透過義民論述與粵人論述相互結合，在臺灣的人群中明確區分出「粵人」的身份認同，在 19 世紀中期更與南臺灣六堆的粵人認同合流。這一認同至 19 世紀末與 20 世紀初，進一步以粵人為界限，將原來他

稱的客人 (kelang, 即 *guest people*) 轉化為自稱之客人 (Kelang, Hagng-ing) (羅烈師 2006: 13、17-18、272、277)。

林正慧則比較強調是方言認同，表示結合中西文獻可以發現，在清代臺灣，「客人」(ke-lang) 可能是頗早就存在於民間社會的一種對方言人群的稱謂，康熙末年下淡水地區的客方言人群即以「客民」自稱，表達自己是跨省的同方言人群，乾隆年間的文獻可以看到「客人」與「狃狃」的對稱，道光年間北路粵人也以「淡屬客人」自稱，咸豐年間「鶴老」一詞已刻印在碑記之上，以及 19 世紀西人的記述資料顯示他們認知中的 Hakka，是當時在臺灣被稱為「ke-lang」的一群人。由此可見以「客人」作為方言人群之稱謂，應是清初以來持續存在臺灣的民間社會，與文獻上只以省籍或州府縣別之的識別方式有差，但仍在清代的文獻中若隱若現。此外，尚須留意的是，在清代的臺灣，「粵人」與「客人」所代表的人群意涵，很大程度是重疊的。由於臺南、高雄、屏東有比較多的粵籍福老，我們不能貿然地將文獻上的「客」等同於客方言人群，但由下淡水地區歷次的分類械鬥看來，這些與「閩」交好的「潮人」，時有「自外於粵」的認同模式，即將「粵人」用以稱呼粵之嘉應州人，以及當地的閩人也願意讓粵籍福佬分享學額。因此，就下淡水地區而言，時序愈往後，文獻上書寫的「客」或「粵」愈趨同於客方言人群 (林正慧 2015a: 198、497)。

施添福認為，自康熙 60 年 (1721) 發生朱一貴事件後，自南而北爆發多次的閩粵械鬥。表面上看來，係以閩粵為界，但對抗的團體，實以方言為界限，就是福老和客人的區域性對抗。這些械鬥使原屬粵省的潮汕福老人逐漸從粵的範疇游離出來，而與閩籍的福老結合；另一方面，

隸屬閩籍講客語的汀州人也同樣脫離閩籍範疇，加入粵籍成為客人的一部分。兩大方言群在臺灣歷史上對抗的結果，促使閩、粵人成為跨越省籍的文化概念。在這個文化共同性的概念下，不但使粵籍或粵人成為講客語的客人，而且也使省籍轉化成族群分類成為可能（施添福 2014b：23），似乎也較傾向方言認同。

由上可見，目前比較明顯的歧義在於清代客方言人群究竟是省籍認同還是方言認同。羅烈師由清代竹塹地區的研究，傾向省籍認同大於方言認同，林正慧與施添福由清代下淡水地區的研究，傾向方言認同大於省籍認同。其中的差別應該不是學科領域的差別，而是彼此研究區域的差異，亦即造成兩方看法歧異的最大變數，可能在於南北兩地廣東福佬採取了不同的立場與態度。一如施添福（1998：16）曾經的疑惑，清代在臺灣南部不被認同為客家的廣東福佬人，為何和如何在北部逐步變成為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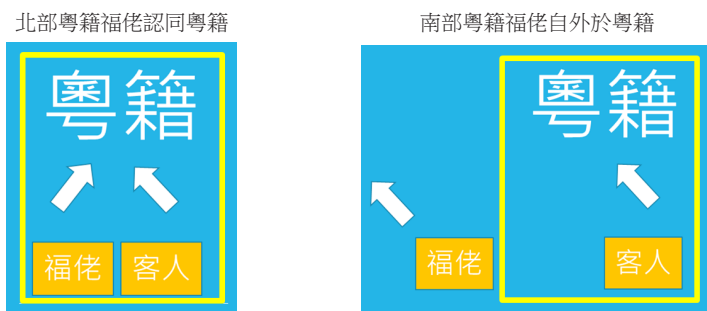


圖 4 南北兩大客區廣東福佬的認同差異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針對羅烈師藉由義民信仰說明北部粵庄有強烈的「粵人認同」，張正田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枋寮義民祭祀圈內粵庄的祖籍別，與圈外的粵籍存在差異，圈外的粵籍多以嘉應州為主，方言較為一致，而圈內各粵庄祖籍成分多源，所操客語口音各異，大致上的共同特點是惠州府籍或潮州府籍者比例偏高，嘉應州籍者相對偏低，如其中新屋、觀音、寶山的「惠州比」高達 80-90% 之強，顯示三地主要通行之客語以「海陸腔」為主。張正田（2010：77、177）認為，就是因為該地雖同為粵籍，但存在不同的次方言，才需要以強調「粵東」原鄉認同的方式來加強團結、淡化差異。張正田與羅烈師對於義民信仰如何凝聚粵人認同看法雖不一致，但不約而同地呈現出與南部六堆不同的以粵籍為認同的現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若參看上述地理學界近年來的研究，可以發現清代竹塹地區以粵籍為認同，並不僅限於所操客語各異的惠潮二府客方言人群，可能還有為數不少的廣東福佬。施添福（1998：14）即提及，來自饒平的六家林家和來自陸豐的新豐徐家、北埔姜家，事實上並不是來自客家文化區，而是來自福佬文化區，只不過這些縣份的邊界附近一帶，正介於客家和福佬文化區的接觸地帶，因此他們在語言上，究竟是操客家方言、福佬方言，還是雙語，都必須個別追溯才能得到答案。這些答案在近年來韋煙灶研究群的相關研究中已呼之欲出。

根據韋煙灶對桃竹地區姜姓宗族的研究，發現桃竹地區姜氏宗族的祖籍地，不管是陸豐大安、碣石衛或漳州龍溪，均屬於閩南語區。姜姓宗族從較早期的乾隆 40 年到道光 12 年，均能維持使用閩南語，且具備使用閩客雙語能力，姜姓的族群屬性亦閩亦客。如九芎林姜勝智，其先祖先遷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江豆村崗頭梳，後遷惠州府陸豐縣大安墟，

判定九芎林姜勝智派下為閩南人，但因與上游客語區族群長久接觸而習得雙語能力（韋煙灶 2010）。或是今定居於新竹縣湖口鄉長安村北窩黃厝的黃姓，其原鄉為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大安墟石寨（今汕尾市陸豐市大安鎮石寨村），屬於閩客交接地帶的閩南話區。北窩黃厝 80 餘歲的黃姓耆老所操的閩南話仍帶有原鄉陸豐大安閩南話的特點，遷臺之後定居湖口北窩屬於海陸客家話區，已趨向於客家化（韋煙灶、曹治中 2013：58-59）。

李科旻（2013：112-113）發現，清代鳳山流域一帶的粵籍閩南人在原籍地即藉韓江、螺河、黃崗河等水系，與上游客鄉早有熱絡的山海資源交易，來臺時已是能使用閩客雙語的社群，故多能融入客家社會，目前自我族群認同皆為客家人。部分宗族如原籍汕頭市澄海區上華鎮小茅埔曾汝拱派，原籍潮州市饒平縣新塘鎮的大茅埔張光耀派，曾返原籍祭祖，卻發與原鄉同宗族人所操方言不同，以致溝通不易。



圖 5 臺灣客家形成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不同學科的激盪、對話與互為補充，讓清代人群互動的豐富樣貌得以日漸清楚。由此也可看出，原本以為對客家形成論述的歧義之處，其實是清代人群互動的區域差異，而這些差異為何或如何形成，又是另外一個可以繼續探究的課題。

五、結論

本文藉由史學遇到客家的歷程，回顧戰後以來，對於臺灣客家這個研究主題，史學研究是在成說密佈的迷霧森林中逐步展開，看似盤根錯結的成說大致可分為兩個脈絡：其一是華南客家形塑過程的諸多論述，如方志中的土客書寫、徐旭曾的客人論述、19世紀西方人的 Hakka 論述、林達泉的客說、嘉應州志的客家論述，乃至於 1930 年代由羅香林以學術論述完成的中原南遷史。其二是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對漢人分類的誤解，其因受西方 Hakka 認知影響，復遵從清代舊慣，而將省籍視為有種族意涵的方言界線，將福建人視為說閩南方言者，廣東人視為說客方言者，留下不少有粵即客，閩即福意涵的調查統計或文獻資料，可能也因此誤以為以粵籍為主信仰的三山國王是客家的專屬信仰。這些成說經過時間的洗禮，一再被轉述強化，而成為戰後研究臺灣客家歷史的基本論述內容或參考文獻。

以史學方法研究一直被認為有長久歷史的客家，卻始終面臨歷史文獻中找不到客家身影的疑惑，以文獻中粵、客之書寫詮釋為客家，卻面臨歷史文獻清楚表示閩粵兩省界內均存在不同方言人群，到底何謂客家似陷入難以解釋的困境。於是研究客家歷史，卻無法不一直自問何謂客

家？而終促使史學研究者回頭面對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何謂客家」。

到底何謂客家？史學研究先突破對客之書寫的刻板印象，雖然研究的起點是臺灣的客家，但由於形塑的起點在 19 世紀的華南，因此追問什麼是客家的同時，必須先轉至 19 世紀的華南。重新檢視歷史文獻，逐漸了解清中葉後華南客家形成的歷史脈絡，如 19 世紀西人對華南 Hakka 的溯源，用華南的認知描述臺灣 Hakka，清中葉後徐旭曾、林達泉、對客的祖溯中原論述，以及民國初年以來客籍士紳在一再被污名化過程中對客家源流的申辯，乃至 1930 年代羅香林之論述是前述中西共同為客家祖溯中原的集大成之作。原來這些研究者每必徵引的論述內容都有其時空背景，不應逕視為歷史事實。回到臺灣，研究者發現客方言人群在清代被稱為粵人、客人，日治被視為廣東人，至戰後始開始以客家自稱，並嫁接起中原南遷的漢族歷史。經過解構客家，史學重新認識客家，了解客家在華南曾經如何被建構，也了解了臺灣客家的形塑有著與華南不同的軌跡，至戰後方殊途同歸的歷程。

基於史學重視殷鑒之功能，必須提醒日後研究臺灣客家歷史者，需先充分了解臺灣客方言人群由清代、日治乃至戰後的形塑過程，儘量避免以今日의客家概念投射到清代或日治時期的研究當中，戰後的史學研究，花了數十年才弄清楚客家的中原族史是建構而來的產物、19 世紀西人對臺灣 Hakka 論述是受華南認知的影響，以及將廣東人視為客家人是日本殖民政府的誤解等。這些前車之鑒在在提醒我們，研究歷史應避免將今日의客家概念投射於清代或日治的研究當中，因為這樣不僅可能影響研究者本身的判斷、忽略歷史時空下人群互動的多樣性，也可能留下錯誤的訊息，又誤導了之後的研究者。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史學遇到客家，也像是面臨一個關於史料運用的考題。若未能究明客家形塑的軌跡，即使是重視並鑽研史料甚深的治史者，也可能被不同時空下產生的文獻所迷惑。以前的史學研究認為歷史可以是客觀的，史料可以不辨自明。但史學反思客家的過程，同時見證了社會科學的邊緣理論、建構理論等在歷史上真實發生的過程。那些族源論述不能直接視為歷史事實，必須回到發生的時空脈絡，理清其形成的經過，才可能還原歷史的事實。因此，就客家研究而言，史學除了固守對史料的重視之外，已難閉門造車，必須多方與其他學科溝通對話，才能探究出比較真確的客家歷史。

客家研究殊異於以往典型的歷史研究課題，具有高度跨領域性，過去史學在研究客家的過程中，已能多方與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進行對話，日後應再擴大範圍，如地理學、語言學或其他學科，不同學科間聚焦共同的研究主題，以開放的心態，及各自專長的研究方法進行學術論辯或交流，對於臺灣客家研究的深化，想必是值得期待的。

參考文獻

不著撰者，nd，〈胡氏系統圖〉，臺北：國家圖書館藏，美國猶他家譜學會編號：19830315。

尹章義，1985，〈閩粵移民的協和與對立：以客屬潮州人開發臺北以及新莊三山國王廟的興衰史為中心所作的研究〉。《臺北文獻》直字 74：1-27。

_____，1991，〈臺灣移民開發史上與客家人相關的幾個問題〉。頁

- 257-280，收錄於吳劍雄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四輯。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_____，1997，〈臺灣客家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文獻》48(2)：
1-13。
- 王明珂，2005，〈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介點〉。
頁 87-106，收錄於康樂、彭明輝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王凱英，2015，《南投信義鄉客家聚落發展之研究》。彰化：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晴佳，2003，《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
臺北：麥田出版。
- 王慈韻，2012，《日治時期新埤聚落與外庄互動情形之研究》。屏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瑛曾，1962，《重修鳳山縣志》，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丘昌泰，2011，《臺灣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田金昌，2005，《臺灣三官大帝信仰：以桃園地區為中心（1683-1945）》。
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石萬壽，1986，〈乾隆以前臺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臺灣文獻》37
(4)：69-90。
- 江金瑞，1998，《清代臺灣義民爺信仰與下淡水六堆移墾活動》。臺中：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中杰，2007，〈六堆周圍地區清代廣東移民屬性初探〉。論文發表於

「六堆歷史文化與前瞻」學術研討會，屏東縣內埔鄉：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主辦，9月20-21日。

吳正龍，2013，《清代臺灣的民變械鬥與分類意識的演變：以林爽文事件為中心所作的探討》。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

吳嘉賢，2010，《寺廟、家族與東勢地區的客家社會（1683-1920）》。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所碩士論文。

呂思勉，2002，《歷史研究法》。臺北：五南圖書。

李文良，2003，〈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臺大歷史學報》31：141-168。

李科旻，2013，《清代新竹鳳山溪流域閩客族群空間分布之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

李劍鳴，2007，《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杜正勝，2004，《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

杜立偉，2008，〈臺灣三山國王信仰研究述評〉。《臺灣文獻》59（3）：129-174。

杜維運，1985，《史學方法論》，七版。臺北：杜維運。

林本炫，2011，〈苗栗縣客家地區鄉鎮志與縣志中的客家宗教意象〉。頁129-48，收錄於羅烈師等，《客家書寫：方志展演與認同》。苗栗縣三灣鄉：桂冠。

林正珍，2005，〈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1950-2000〉。頁54-75，收錄於康樂、彭明輝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林正慧，1997，《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
- _____，2005，〈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為起點〉。《國史館學術集刊》6：1-60。
- _____，2006，〈從客家族群之形塑看清代臺灣史志中之「客」：「客」之書寫與「客家」關係之探究〉。《國史館學術集刊》10：1-61。
- _____，2010，《19世紀西人眼中的臺灣 Hakka (1945-1987)》。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 _____，2013，《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
- _____，2015a，《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_____，2015b，〈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臺灣 Hakka〉。《臺灣文獻》66(1)：107-160。
- 林秀昭，2007，《北客南遷高雄地區的開發與義民爺信仰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佳締，2012，《客家聚落發展歷程比較研究：以長治鄉潭頭與屏東市田寮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欣宜，2014，〈「財產是十四大庄公共」：日本統治前期新竹枋寮義民廟廟產經理公共制度化的形成〉。《全球客家研究》2：165-217。
- 林美珠，2015，《日治時期新竹州人口外移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

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林偉盛，1987，《清代臺灣分類械鬥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雅婷，2012，《桃園閩客交界地帶的族群空間分布特色與族群互動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林雅婷、韋煙灶，2010，〈桃園縣新屋地區粵東族群的空間分布特色及其與歷史地理區域劃分之關聯性〉。《社會與區域發展學報》3（1）：97-140。

邱彥貴，1992，〈三山國王是臺灣客屬的特有信仰？：粵東移民原居地文獻考察的檢討〉。《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3：66-70。

施志汶，1994，〈「臺灣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來國內各校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為中心（1983-1992）〉。《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2：413-446。

施添福，1987，《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_____，1998，〈從臺灣歷史地理的研究經驗看客家研究〉。《客家文化研究通訊》1：12-16。

_____，2011，〈從「客家」到客家（二）：客家稱謂的出現、傳播與蛻變〉。論文發表於「第三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暨施添福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9月23-4日。

_____，2013，〈從「客家」到客家（1）：中國歷史上本貫主義戶籍制度下的「客家」〉。《全球客家研究》1：1-55。

- _____，2014a，〈從「客家」到客家(2)：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全球客家研究》2：1-114。
- _____，2014b，〈從「客家」到客家(3)：臺灣的客人稱謂和客人認同(上篇)〉。《全球客家研究》3：1-109。
- 柯光任，2012，《日治以來彰南地區客家移民與竹塘醒靈宮之研究》。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所碩士論文。
- 洪馨蘭、莊英章，2018，〈導論：遷徙適應與認同建構〉。收錄於莊英章、黃宣衛主編，《客家移民與在地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韋煙灶，2010，〈桃竹地區姜姓宗族源流與分佈的考察〉。《新竹文獻》42：58-67。(2010年12月)，頁65。
- _____，2011，《清代竹塹地區粵籍移民裔的遷徙、語言重整與認同客家化歷程之探討》。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 _____，2013a 〈詔安客家族群空間分佈的歷史地理詮釋。《中國地理學會會刊》50：81-112。
- _____，2013b，〈「兩岸閩客交界地帶族群分布所顯示的地理與語言意涵」之研究歷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5(1)：53-59。
- 韋煙灶、林雅婷，2013，〈清代大溪墘庄閩、客宗族互動關係之探討：以姜、范姜、郭三姓為例〉。《地理研究》58：33-74。
- 韋煙灶、林雅婷、李科旻，2009，〈以地圖作為研究工具來解析臺灣閩、客族群分佈的空間關係：以桃園新屋與彰化永靖的比較為例〉。

頁1-22，收錄於《第十三屆臺灣地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韋煙灶、曹治中，2013，〈以閩、客式地名來重建臺灣閩、客族群原鄉之歷史方言界線〉。《臺灣博物》32（4）：54-59。

韋煙灶、葉佳蕙，2010，〈新竹紅毛港區域的形塑與發展〉。《新竹文獻》42：22-40。

唐立宗，2002，〈敬恭桑梓：近代廣東志書的編纂活動與「客家」途述〉。發表於「第二屆客家研究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12月24日。

_____，2005，〈清代廣東方志的「客民」、「客匪」與「客家」論述〉。論文發表於「第四屆青年學者論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風學社主辦，12月24日。

孫連成，2011，《客家義民形象及義民爺信仰的建構：文獻與影視的交融互證》。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

高怡萍，2004，《徘徊於聚族與離散之間：粵東客家的族群論述與歷史記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正田，2010，《從族群關係看清代臺灣桃竹苗地區義民信仰區域差異：以清代苗栗堡為觀察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欣儀，2004，《天主教會與地方社群關係之研究：以桃園地區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智欽、韋煙灶、林雅婷，2009，〈祖籍的空間分布特性與歷史地理區

- 域形塑之關聯性探討：以楊梅及新屋地區為例〉。《人文及管理學報》6：95-132。
- 莊青祥，2017，〈福佬客？廣東福佬？三山國王信仰與堆外粵人廣東移民屬性研究：以屏東崇蘭、海豐、九知為例〉。《屏東文獻》21：125-152。
- 莊英章，2019，〈族群互動、文化認同與「歷史性」：客家研究的發展脈絡〉。收錄於蕭新煌編，《客家研究與客家學》。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 連文希，1972，〈客家之南遷東移及其人口的流佈〉。《臺灣文獻》23（4）：1-23。
- 陳志豪，2008，〈臺灣隘墾史研究的回顧：以竹塹地區的研究成果為例〉。《臺灣史料研究》30：70-85。
- 陳秋坤，2004，〈清代臺灣地權分配與客家產權以屏東平原為例（1700-1900）〉。《歷史人類學學刊》2（2）：1-26。
- 陳雪娟，2007，〈北臺灣客家義民信仰：以苗栗市義民廟為例〉。《史匯》11：43-72。
- 陳朝海編，1984，〈普寧樂善堂陳家族譜〉，臺北：國家圖書館藏，美國猶他家譜學會編號：1418847。
- 陳運棟，1989，《臺灣的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
- _____，2000，〈臺灣客家研究的考察〉。收錄於徐正光編，《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歷史與社會經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陳嬾羽，2011，《苗栗公館泥坡子陳立富家族在臺的拓墾與發展》。臺

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陳麗如，2011，《臺灣北部地區客家婦女生活的演變：以婚姻和教育為中心所作的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

陳麗華，2011，〈談泛臺灣客家認同：1860-1980 年代臺灣「客家」族群的塑造〉。《臺大歷史學報》48：1-49。

_____，2013，〈「消失」的族群？南臺灣屏東地區廣東福佬人的身分與認同〉。《臺灣史研究》20（1）：169-199。

_____，2018，〈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的淵源與轉變（1920-1980 年代）〉。收錄於莊英章、黃宣衛編，《客家移民與在地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彭明輝，2005，〈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頁 230-272，收錄於康樂、彭明輝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游振明，2001，《當客家遇到福佬：中壢地區的社會變遷研究（1684-1920）》。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俊傑，2005，〈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950-1980）〉。頁 273-316，收錄於康樂、彭明輝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黃啟仁，2007，《恆春地區客家二次移民之研究：以保力村為例》。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詩涵，2011，《由古書契論北淡地區客家移墾：以汀州客江、潘二氏為例》。臺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 溫林文，2010，《清代新竹橫山地區隘墾社會的發展》。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吏桓，2016，《美濃聚落發展與伯公信仰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
- 劉煥雲，2003，〈臺灣客家學初探〉。《漢學論壇》2：125-147。
- 劉還月，1999，《臺灣的客家族群與信仰》。臺北：常民文化。
- _____，2000，《臺灣的客家人》。臺北：常民文化。
- _____，2001，《臺灣客家族群史·臺灣客家的初墾與二次移民》。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潘孟鈴，2000，《屏東萬巒開發的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采秀，2004，〈以順稱義：論客家族群在清代臺灣成為義民的歷史過程〉。《臺灣史研究》11（1）：1-41。
- 鄧楨輝，2015，《汀州客家再移民與認同變遷研究：以陳留堂謝姓族人為中心（1797-1952）》。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新煌，2018，〈臺灣客家研究的典範移轉〉。《全球客家研究》10：1-26。
- 賴文慧，2009，《臺灣汀州客二次移民研究：以苗栗縣造橋鄉平興村謝姓家族為例》。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賴玉玲，2000，〈新埔枋寮褒忠義民廟的客家公號〉。《史匯》4：19-38。

- _____，2001，《新埔枋寮義民爺信仰與地方社會的發展：以楊梅地區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薛雲峰，2009，《臺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 1895 乙未抗日戰爭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 謝宏武，1994，《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簡志維，2005，《清代苗栗大湖墾隘的發展：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簡炯仁、陳謹瑛、林秀昭，2009，《高雄市客家史》。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 藍鼎元，1958，《東征集》，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第 1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羅烈師，1999，〈臺灣地區客家博碩士論文述評〉。《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117-137。
- _____，2003，〈客家邊緣：尋找台灣竹塹地區閩粵界線〉。論文發表於「客家、族群與多元文化研討會」，苗栗縣苗栗市：苗栗縣文化局主辦，12 月 13-4 日。
- _____，2006，《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新竹：清華大學人類所博士論文。
- Maza, Sarah (莎拉·瑪札) 著、陳建元譯，2018，《想想歷史》。台北：時報出版社。